

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谭群玉

[提 要]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最有实力的派系，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唐绍仪在 1918 年军政府改组时，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进入权力中枢，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使他们主张、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关键词] 唐绍仪 益友社 军政府改组

[中图分类号] K258.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04) 05—0108—06

唐绍仪是戊午（1918）年军政府改组当选的七总裁之一，益友社则是护法国会中，最有实力的派系。对于唐绍仪、益友社与军政府改组的关系，以往研究比较注意在陆荣廷与孙中山的矛盾对立中，唐绍仪等人“不偏不倚”的调和作用^①，以及益友社在以合议制取代大元帅制过程中，与桂系、滇系和政学会被动的合作关系^②，其实这些调和者另有政治目的，因而主张实行军政府改组，不乏主动性。深入探讨二者的深层关系，有助于揭示唐绍仪当选为总裁的潜因、民党部分稳健派的政治诉求，以及政治转型时期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

护法时期南北对立局势形成后，南方各派在反对段祺瑞武力专制问题上，利害一致，但对各自在南方政权中的地位，存在矛盾。此时南下的议员，主要由旧国民党员组成，其中又分为三派，即被视为稳健派的益友社和政学会，及急进派的民友社，他们分别拥戴唐绍仪、岑春煊、孙中山为领袖。益友社与孙系民友社政治倾向不同。1916 年 8 月国会恢复后，孙派主张通过培植军事实力，讨伐北洋派，夺取政权；益友社则主张利用在国会占多数议席的有利条件，与北洋派平分政权^③。益友社与政学会在主张通过渐进，实现社会改造上，见解相同，但对由谁出任未来政府领袖，存在分歧。西南武人派由于地域关系，划分为桂系和滇系。他们比较看重军事实力的作用，但在力量扩张过程中，不免发生冲突。原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则系奉

黎元洪之命,“冀为后图”^④。正是因为各派宗旨、利益时同时异,导致他们在政局中时合时分。

益友社主张采用合议制,是要推戴他们心目中“领袖西南”的“总枢”唐绍仪^⑤,后者对此也不乏幻想。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护国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委托其从事旧国民党的恢复工作。民党分化后,唐绍仪成为益友社的实际领袖。益友社在南下议员中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占据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副议长两个要职,“实力为各派之冠”^⑥,在国会中举足轻重。主张议会政治的唐绍仪,一直渴望藉益友社的力量,在政治竞争中取得相应地位。军政府建立前,他就主张实行合议制,理由是“军务院组织手续较单简,故成立较速,各事便可进行。”^⑦袁世凯之后,中国群雄并立,任何一派都不能占绝对优势,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同掌中枢,寻机发展。但孙中山建立的军政府,采取大元帅制,使各派领袖希望落空。唐绍仪退居原籍香山唐家湾,不就财政部长职,即已隐示他对大元帅制的不合作态度。军政府成立后,南方各派决定用合议制代替大元帅制的较早记录,是益友社主要成员、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于1917年10月10日晚,约人在广州南园府中,讨论西南联络一致办法,“暂假定联邦制”^⑧。筹划者还包括益友社首领王正廷,以及孙中山的得力干将胡汉民、汪精卫,由此不难推测孙政府处境的艰难。

对于唐绍仪与军政府的关系,以往研究者意识到,唐终未到任,是因为他“对护法北伐和军政府内部的团结有某些不同看法”,但仍视其为桂系与孙中山矛盾中的“调和”者^⑨。实际上,唐绍仪此时对孙政府完全持反对态度。7月3日,当他与孙中山、程璧光等在上海时,就反对孙设立临时政府的建议,致使“议不决”,实际上是不愿孙出任临时大总统^⑩。10月12日,当伍朝枢与王正廷到香山造访他时,唐对于政治委员制和组织稳健派党表示赞成,愿意帮忙,但以孙中山离开广东为条件^⑪。后来益友社与政学会联合建议,用“合议制”代替大元帅制,与唐绍仪私下态度,有密切关系。益友社首领之一、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对孙中山出任大元帅,一开始就持有异议,只是碍于反对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共同需要,以及对孙的经费依赖,而暂时隐忍。当大元帅制受到西南实力派抵制时,便乘机主张用合议制代之^⑫。

以合议制代替大元帅制,本是除孙中山以外的其他西南各派领袖乐于接受的事实,但在西南联合会成立过程中,由于滇桂两系先后操纵,企图独家把持,从而遭到其他势力的强烈反对。唐绍仪认为成立联合会议是“画蛇添足,自相纷扰”^⑬。益友社希望护法政权改行合议制,但并不主张将非常国会建立的政府推倒,另立一个由西南武力派自发结合的权力机构。因为军政府由非常国会产生,府、会命运一致。如果军政府被取消,不仅局面混乱,对国会本身也诸多不利,故认定桂系若取消非常国会以否定军政府存在,则与北洋军阀“同样违法”^⑭。这时外交形势的变化,使得寻求外交承认和援助迫在眉睫。但与外国有着密切交往的唐绍仪、伍廷芳,则以没有明确统一机关对付,“殊难着手”,主张必须先使列强承认西南为交战团体,然后有确实组织,才能得其承认^⑮,实际上是迫使西南赶速成立一个各派能够接受的联合机构。

可见,唐绍仪和益友社表面上,是孙中山与陆荣廷对立之间的中间势力,实际上他们与孙、陆之间不只是调和关系,而且有利害冲突。当孙中山的大元帅制有碍他们把持政权时,便积极策划,企图用合议制代替单独制。当陆荣廷的桂系企图独自操纵旨在统一西南的西南联合会时,他们又以不合作为抵制。在他们的政治主旨驱使下,致使军政府改组案再次被提出。

二

唐绍仪等主张军政府改组,是为了均衡各派权益,以与孙中山平起平坐。1918年2月2日下

午，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三人，邀请孙中山、莫荣新等在海珠举行会议，议定将军政府及护法联合会合并，改为联合政府，设政务委员七人，以合议制均衡各派权益，目的是使伍、唐、程诸人与孙“居于同等政治地位”^{①⑥}。这种符合其“历来主张的平分政权的政见”^{①⑦}，显示了中间势力热心调停的政治目的所在。各派的利害关系相互制衡，是合议制产生的主要原因。

海珠会议后，各方在政学会议员汤漪起草的“联合政府组织草案”基础上，拟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草案。非常国会还议定用合议制改组军政府，并决定由唐绍仪、伍廷芳、程璧光及吴景濂四人通电护法各省各军，征求同意，再由国会非常会议正式通过。但各方对修正案“反应冷淡，桂系且明示反对”^{①⑧}。关于孙中山在海珠会议后的反应，据其本人4月份回忆，当伍朝枢与他商量军政府改组案时，他即直接以违法“拒绝之”。后来伍朝枢又请唐绍仪调和，唐拿出改组条例，孙中山顺笔将“联合”政府改为军政府，唐“始有难色”，但他拿经孙改过的条例给伍廷芳看时，伍则“甚满足”，第二天就马上想要国会通过，宣称条例是经过孙中山修改认可的。后因为时过促，未能通过^{①⑨}。这说明孙、唐、伍三者对军政府改组问题上，意见相当不一致。由于桂系公开反对，唐绍仪与伍廷芳一度提出联合会与军政府并存方案，主张，“联合会议筑于武力之上，以之对内；军府筑于民意之中，以之对外。分途救国，并行不悖。”这种折衷办法，得到粤督莫荣新赞同。于是莫通电各方，催派代表，藉以“对付时局”^{②①}。

3月下旬，由于段祺瑞重新组阁，北方战和形势骤变，南北矛盾再度成为主要矛盾，南方各派关系因此有所改变。为防止北方乘虚而入，因而产生“团结以对外北方之意志”^{②②}。唐绍仪、伍廷芳以及部分议员提出的孙陆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方案——军政府改组案，成为包括孙派、非常国会及其政治代表、海军、滇系和部分桂系共同接受的平衡方案，4月初，陆荣廷终于答应赞成改组，军政府改组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唐绍仪、益友社与军政府改组的关系，以往人们较多注意到其调和、附从、以及为经济利益所趋的被动一面，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他们主动、自觉的一面。首先，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系由益友社、政学会议员共同提议，并建议开会讨论。4月10日，非常国会修正案的提议人，主要包括益友社骨干罗家衡、张瑞萱、褚辅成和政学会骨干汤漪、李述膺等。非常国会初读会以40余票多数赞成通过改组案，也是益友社与政学会议员合作的结果。会议推定的临时审查委员21人中，包括益友社、政学会和民友社议员。并照例以首列议员罗家衡为委员长^{②③}。其次，益友社对修正案态度坚决，说明其政治诉求明确而坚定。修正案提出第二天，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到军府谈话，说明反对改组军府的理由和决心时，吴景濂、褚辅成等仍坚持改组说，声称改组是为了“多扩充军政府的实力”^{②④}。此外，修正案的通过，也与益友社执意坚持有关。改组案正式通过之前，吴景濂藉口有人组织“公民团”准备包围国会，请求地方当局派兵保护。改组案通过当天，直接出面极力主持的也是吴。直到事后他还说，公民团的首领，就是民友社议员叶夏声^{②⑤}。可见益友社首领对军政府改组案的通过，自始至终十分重视，态度坚决，没有他们积极推动，改组根本不能成功。李根源事后给吴景濂等人的致电，也证明了这点^{②⑥}。在各方推动下，5月4日，国会开会，《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经审查长罗家衡报告大会，提出讨论，即席通过。当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

但是，当滇桂系企图以调和名流岑春煊为西南领袖，平衡滇、桂、孙矛盾，并方便与北方政府谋和意向表露时，益友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提出，军政府不宜“率尔更张”，主张等到6月正式国会召开后再说^{②⑦}；并希望通过挽留孙中山，抵制岑春煊等主和^{②⑧}。可见益友社推进改

组，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当他们发现改组有可能被桂系和政学会利用，作为牺牲非常国会，与北方议和的工具，危害自己利益时，即力图阻止。桂系的武力强制，使益友社的补救措施未能实施。张开儒案的发生，致使修正军政府组织法经二读、三读会飞快通过，军政府改组案正式确立。

益友社延缓改组案成立的企图虽然未能奏效，但在改组后军政府的名称上，则如愿以偿；唐绍仪在议会中最高的支持率，也使之对未来充满希望。西南实力派曾经主张，改组后的南方政府，采用“联合政府”名义，以示与原来孙政府有别。但在改组案二读会讨论本议题时，议员们将“联合”二字删除，直称中华民国军政府^②，以使改组后军政府与原来军政府保持了行政上的连续性。说明尽管处于实力派势力之下，国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也显示了益友社实际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体现自己意志的机会。对于军政府改组的实质，有人认为是“把大元帅的首领制取消，改为实力派的首领合议制”^③。实际上合议制并非实力派独享，也包括民意派参与，体现了分权制度之下，议会是国家政治中不容忽略的部分。此外，从5月20日唐绍仪等七人被选为军政府总裁的情况看，唐绍仪得票最高，以115票当选。可见如果纯取民意，由非常国会选举南方领袖，唐绍仪最有希望当选。这也是唐一直做着总统梦的资本。

益友社与政学会在反对大元帅制上，虽有共同立场，但对由岑春煊还是益友社代表主持南方政局，存在根本分歧，说明此时不仅民意派与西南实力派、民意派内部稳健派与急进派之间，由于政治趋向、实现政治目标手段及利害的不同，在政权问题上存在冲突，即使是政治手段主张相近的稳健派之间，由于拥戴领袖不同，也会产生利益制衡作用。

三

舆论界认为，改组后的军政府，由稳健派占据势力^④。此时日本政府也倾向于由国民党稳健派而非急进派首领，出任中国南北统一政府首脑。日本政府为了促成中日军事同盟，共同干涉苏俄革命，加紧诱迫西南护法各派与北洋派妥协。3月4日，唐绍仪离沪赴日，北方研究系首脑汤化龙也于4月初抵达东京。据报道，日方提出调和中国战事的方案之一，是由唐绍仪或岑春煊担任国务总理，组织南北两派联合内阁，但以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为条件。对此，唐绍仪有“受愚”之感，“坚决谢拒之意”，声明“调和非一种买卖，如此条件，殊不能容许。总统选举何人，仍国会之权限，非吾之所能”^⑤，似乎对自己由国会选为总统，还有所期待。

关于唐绍仪不就任军政府总裁一职的原因，以往因依据材料和视角不同，看法截然相反。有人意识到，唐绍仪不就职，是不愿与改组后的军政府合作。究其原因，则认为是为了与孙中山保持一致^⑥。但也有人注意到，6月中旬，孙中山途经日本转赴上海期间，并未与唐会晤，从而猜测此时唐与孙或许政见歧异。唐对改组后军政府持“不介入”态度，“或许是想超然于西南护法各派的内部争斗之上进行调和”^⑦。改组军政府是唐绍仪积极努力的结果，改组成功却不就职，有两个可能：一是对改组结果不满，二是有更大愿望。唐绍仪宣称，他将以国会行动为行动，只要两院正式开会，“自当就任”^⑧，并公开致函非常国会，希望早日达成法定人数，正式开会，以利内政外交^⑨。记者推测，唐绍仪特别强调国会的作用，大概是因为护法战役即为国会而起，国会为民主国主体，有国会才可产出政府，行使权能^⑩。从中不难看出唐绍仪对未来政权的期许。军政府改组，规定主席总裁将由政务总裁和各省各军代表组成的政务会议推选，而不是由国会选出，致使在国会中得票最多的唐绍仪，有可能屈居于得票最少的岑春煊之下，令其难以接受。而

且当时日本正在调停中国南北，有支持唐绍仪或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的打算，唐滞留日本，与此或有关。

主席总裁的归属，是军政府改组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引起种种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孙中山与吴景濂主张由伍廷芳担任，巫山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柏文蔚和美国若干舆论也支持伍^①。益友社推荐的主席总裁人选与政学会、桂系的不一致，也可说明益友社在戊午军政府改组问题上，并非桂系和政学会的附从。由于唐继尧与陆荣廷鼎力支持岑春煊，加上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多方疏导伍廷芳和林葆懌^②，致使岑最终被选为军政府主席总裁。

军政府改组，使益友社势力进一步得到扩张。改组后的军政府，实际上是各派力量的联合政府。益友社推崇的领袖唐绍仪没有到任，接近益友社的伍廷芳，可算是益友社利益的代表者。伍廷芳在这次改组中，担任了军政府总裁兼外交总长，后又兼任本拟委任唐绍仪的财政总长，成为军政府中权势仅次于岑春煊的第二号人物。其子伍朝枢则囊括了总务厅长和外交次长。而改组后军政府各部的组织形式，是由各部首脑自行组织办事人员，基本是各自的原班人马^③。此外，政务会议置参议9人，有向政务会议建议、及答复咨询的权利^④。其中，也有褚辅成、易次乾等益友社代表^⑤。旧国会重新开会后，对众、参议院议长略作调整。因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不肯南下，9月16日、10月19日分别改选褚辅成、林森^⑥，在改选后的护法国会两院正副议长中，只有林森为民友社代表，其余均为益友社成员。军政府改组后，益友社的势力占据财政、外交、总务等重要部门，以及国会参众两院4个议长中的3个席位，成为南方军政府和国会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部分显示了民意派力量向民初权力中枢的渗透。

但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意愿并未完全达到。主席总裁由政务会议而非国会产生，在总裁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益友社领袖唐绍仪，并未成为主席总裁的候选人，这或许是唐迟迟不愿就任总裁的原因之一。此外，由益友社推荐、与之关系密切、利害一致的伍廷芳，也未能当选为主席总裁。反映了益友社在势力扩张的同时，受到西南实力派的制约。可见，武力的权威在此时民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戊午军政府改组，实为南方各派政治势力冲突与妥协、制约与平衡的结果。在没有一个强力中心、群雄并立的情状下，政治运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基于实力与民意的派系制衡与协调，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的政治特点。

①莫世祥：《乱世中的“调和立国”者——论护法运动时期的唐绍仪》，珠海市政协等编：《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②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影印本，第519～522页；李云汉：《政学会与护法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下册），台北，1985年，第325页。

③《政学会与护法运动》，《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323页。

④⑩章炳麟著：《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

社影印本，第40页。

⑤《吴景濂、褚辅成等就挽回陆荣廷艳电影响事致罗家衡译转唐绍仪电》（1919年6月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04页。

⑥人们一般认为，此时益友社据有参众两院正副议长4席中的3席，其实这是1918年9月16日和10月参众议长重新增选以后的事，而在西南联合会成立和军政府改组前后，益友社仅占4个议长中的2个。

⑦《西南组织政府之近况》，《申报》，1917年8月19日。

⑧⑪伍朝枢：《伍朝枢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217页、第218页。

⑨余炎光、周孝中：《唐绍仪》，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⑫《广东内部之危险》，《申报》，1918年5月23日；吴景濂认为，在孙中山个人的统治下，南方政权不会稳固。见 Linda Pomerantz—Zhang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6.

⑬《张开儒请唐继尧竭力主张召开正式国会密电》(1918年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482~483页。

⑭秦岭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大堆政党》，《春秋》第204期，1966年，第10页。

⑮《钮永建建议西南成立统一机关密电》(1918年1月22日)，《护法运动》，第475页。

⑯⑰《政学会与护法运动》，《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324页。

⑱⑲⑳《乱世中的“调和立国”者》，《唐绍仪研究论文集》，第273页、第275~276页、第276页。

㉑孙中山：《致陈炯明辟改组军政府事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出版：《国父全集》第3册，1973年，第557页。

㉒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0页。

㉓《某政客之军政府改组谈》，《盛京时报》，1918年5月26日。

㉔《改组联合军政府之内幕》，《申报》，1918年4月19日。

㉕《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铎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292页。

㉖南北名人言行录丛书社编：《叶夏声》，正谊社印行，未标出版时间，第34~36页。

㉗《军政府改组后之种种》，《戊午周报》第8期，1918年7月7日，第19~22页。

㉘《粤事别报》，季啸凤、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

料外编》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㉙《褚辅成致吴景濂等函》(1918年5月12日)，董效舒等整理：《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1期，总第42号，第10~11页。

㉚《广东改组军府案与反对孙氏》，《申报》，1918年5月24日。

㉛《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22页。

㉜《关于军事之最近京闻》，《申报》，1918年5月25日。

㉝《东京特约通信》，《民国日报》(上海)，1918年4月25日。

㉞余炎光、周孝中：《唐绍仪》，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第221页；夏琢琼：《试论唐绍仪与孙中山》，《唐绍仪研究论文集》，第227页。

㉟㊱《西南之军政府与国会》，《申报》，1918年7月20日。

㊲《广东联合军政府进行纪》，《申报》，1918年7月22日；《南方政务总裁已举定》，《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6册，第97页；《美国舆论承认南方政府论》，《戊午周报》第25期，1918年11月4日，第26~29页。

㊳《唐继尧请敦请岑春煊就总裁主席密电》(1918年7月27日)，《护法运动》，第521页。

㊴《西南军政府之新气象》，《申报》，1918年8月24日。

㊵《政务会议内部附属机关条例》，军政府总务厅印铸科公报处发：《军政府公报》，1918年8月31号。

㊶《军政府之组织》，《戊午周报》第25期，1918年11月4日，第28~29页。

㊷一卒：《中国政党小史》，《孤军》杂志，第2卷第5、6期合刊，1924年10月，见《北洋军阀》第1卷，第234页。

作者简介：谭群玉，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江中孝]